

# 论现代社会宗教与伦理的互渗和融通

王 晓 朝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摘 要]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面对中国社会现状,从理论上说清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对于克服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道德危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信仰为中介解释宗教与道德之关系,分析现时代宗教与伦理互渗与融通之实质,可以得出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下一步发展就在于如何使其基本伦理准则成为人们的信念。

[关键词]文化视域;宗教与道德;信仰中介;全球伦理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6-0014-06

## On the Mutual Permeability Between and Merging of Religion and Ethic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WANG Xiao-ch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extreme importance to supply a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ethics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xt of 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By taking faith as an intermediary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faith and morality, the present author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mutual permeability between and merging of these two issues.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next step for the "global ethic" is to enable those basic moral standards to become the common faith of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 cultural perspective; religion and morality; faith as intermediary; global ethics

无论在宗教学界还是伦理学界,宗教与伦理的关系<sup>①</sup>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面对中国社会现状,从理论上说清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在实践中指导宗教与团体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对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克服伴随现代进程而来的道德危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能够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清华大学哲学系与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于 2001 年 6 月 27 日至 28 日在香港联合举办了一个主题为“宗教与道德之关系”的学术研讨会,参与讨论的既有宗教学界的学者,也有伦理学界的专家。笔者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文化视域中的宗教与道德”的论文<sup>②</sup>,在文中阐明了笔者对宗教与道德之关系的基本看法:在文化视域中,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信仰是宗教的核心,道德的归宿是信仰,但宗教信仰不是道德的惟一宿主,宗教的功能系于道德,但宗教道德不能取代宗教信仰。在讨论中,笔者发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赞同本人基本观点的主要是宗教学界人士,而对本人基本观点提出质疑的主要是伦理学界的专家。

在此,本人延续在香港发表的“文化视域中的宗教与道德”一文中的基本观点,进一步提出一些

[收稿日期] 2001-07-13

[作者简介] 王晓朝(1953-)男,安徽桐城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英国利兹大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哲学、宗教伦理学研究。

① 伦理与道德有语义上的差别,在本文语境中,伦理与道德用作同义词,可以互换。

② 该次会议论文集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年内出版。

问题来探讨,以期唤起宗教学界和伦理学界对这一理论问题的关注。

## 一、以信仰为中介解释宗教与道德之关系

依据不同的理论框架,学者们对宗教与道德之关系问题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在经历了20世纪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之后,中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文化视域。<sup>①</sup>若将宗教与道德纳入文化视域中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在同一文化系统中,二者都属于文化,也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在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方式并不具有传统教科书式的观点所说的那种对称性(二者都是一种意识形态,都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因而解释任何具体的宗教与道德现象的产生都不能离开对经济基础的分析,否则就陷入用意识解释意识的唯心论),而是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

在文化视域中,道德与宗教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对称的。这一命题的具体含义是(1)在文化的意识层面上,道德虽然也和宗教一样,是诸意识形式之一,对其他意识形式也具有渗透性和包容性,但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依赖性。例如受经济的决定和对政治与宗教的依附,在特定文化环境中,道德可以不依附于宗教,也可以不依附于政治。但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道德依附性的减弱恰恰就是其无法发挥正常功能的开始,亦即社会产生深刻的道德危机的时候。(2)在文化的行为层面上,道德意识的行为化缺乏宗教意识行为化那样的多重保证,道德意识只提供了一种价值判断标准,而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道德,并不能由道德本身来加以保证,而要依靠个人自身养成的道德境界,也就是说,道德实施的惟一保证是人们的“良知”对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3)在文化的体制层面上,道德无法做到像宗教那样的实体化,因此道德的社会功能无法与宗教的社会功能相比。宗教史上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依据某种道德准则,而不是依据某种信仰(其核心又是对神明的崇拜)建立宗教的企图最终不会取得成功。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企业伦理、行政伦理之类的研究,但要说某种体制或组织是依据某种道德规范建立起来的,这种情况可能不多。

为了适应现时代的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恰如其分地阐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笔者认为应当分析具体文化处境中二者的作用和功能,而二者关系的阐明又必须以信仰特性的辨析为中介。在以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样的决定论怪圈,去追问先有宗教还是先有道德,或者简单地发问宗教重要还是道德重要。而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以往简单化的决定论模式不能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

何谓信仰?一般说来,信仰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能动的把握,是对人生最高价值和社会最高理想的反映、评价和把握,是一种动态的动作过程,由这种动作过程而构成的人类信仰活动是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一种文化价值活动。就信仰的性质而言,信仰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对一定观念体系的信奉和遵行。信仰的内容以观念形态出现,但它并非是一般的观念,而是统摄、指导其他一切意识形式乃至社会心理的最高意识形式。就信仰的功能而言,信仰为人类在无限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中建构精神家园,在茫茫的社会生活中为人们确定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在盲目的人生中为人们指示目的和归宿。建立信仰,就是确立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确定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藉此排除围绕人生的无知、怀疑、虚无和绝望,得到知识、价值、理想和希望的慰藉,满怀信心地活下去。就信仰的作用而言,信仰是社会价值、人生价值的定向机制,指导、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并由此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信仰不仅使人在理智上确认

<sup>①</sup> 所谓“文化视域”指的是经由20世纪多学科文化理论的综合研究之后产生、形成的观察问题的文化理论视野、跨越单一学科的理论架构和文化系统论的综合方法。尽管现今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的理解仍然千差万别,但文化视域的形成确实可以视为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中所取得的重要进步之一。

为真,还在情感上体验为真,在心理和行动上追求为真,无论老少智愚都身体力行,世代相传。人类历史上各时代的文明成就,就是以不同的信仰为核心,由信奉者们贡献的劳动、智慧和热情积聚而成的。把握了信仰的一般性质,再加上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道德的依附性,我们可以指出:道德的归宿是信仰,至于这个宿主是宗教信仰还是非宗教信仰,视具体文化环境而定。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信仰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信仰,宗教信仰是道德之最古老、最深厚、最可靠的归宿。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化天下以宗教,崇道德于信仰,曾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在信仰的领域,道德找到了它最可靠的同盟与支持,因为,“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I I p. 78)。在这里,自律取代了他律,信仰消弥了疑惑。道德与宗教信仰的结合是最牢固的一种结合,人类的道德在宗教中找到归宿是一种必然,而不是偶然现象。

道德的出现也许早于宗教、哲学、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但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它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却越来越失去其独立地位,靠依附于一定的信仰体系而存在和施行。这一方面是因为信仰作为人类的最高意识形态,有包容、统摄其他意识形态的奢望和能力,藉此给道德以理论的根据和指导;另一方面是道德作为自身的神圣化、权威性而自觉地趋向于信仰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道德的信仰化与神圣化是道德发挥社会作用 and 功能的必由之路,道德的归宿是信仰,但我们马上还得补充另外一句话,宗教信仰不是道德的惟一宿主,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补充道理十分简单,信仰化与神圣化并不等于宗教化。

道德可以宗教化(指道德要在信仰中寻找归宿,宗教信仰可以成为道德的宿主,道德的实施得到宗教信仰及其体制的保证),那么宗教能否道德化?在文化视域下,这个宗教学界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当作一个假问题来对待。历史上任何一种系统宗教都有其相应的道德规范,而这些规范都已经融入信仰体系。宗教道德之所以能起作用,就在于信仰这种意识形态所起的保证作用。内在的自我在道德上的努力带来的生命也就是由拯救带来的灵魂的升华。不能带来道德力量的宗教信仰是不可思议的。没有道德约束力的宗教信仰绝不能把人由庸俗带入圣洁,反而能够把一些庸俗的人变得更加庸俗不堪,以至于成为社会中一个与人群格格不入的集群。然而道德在宗教的功能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宗教可以归结为道德,宗教可以道德化。道德宗教信仰化后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道德,宗教信仰也并非全部具有道德的意义。宗教信仰中虽然不可以没有道德的成分,但道德不能成为宗教信仰的全部,即绝对意义上的道德宗教信仰化。

## 二、现时代条件下宗教与伦理的结合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为了说明和把握复杂的现象,理论的成功与否在于对现象的解说程度、理论体系内部的自圆其说、以及它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一种理论框架的建立使人们获得了认识某类现象的支柱,但同时也会遮蔽人们的部分视野,看不到这种框架以外的东西。文化视域的形成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也将以往传统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包容于其中。如果能够承认文化视域中道德与宗教具有上述关系,那么进一步考察二者在现时代条件下将以何种方式发生相互作用也就是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

宗教与伦理相结合是思想界和学术界近十年来为之努力的目标之一。寻求“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普遍伦理”)这一思想运动就是其最明显的标志。<sup>①</sup>迈进新世纪之后,这一全球性的思想

<sup>①</sup> 参阅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文化学刊》(2000)4辑相关介绍。

运动仍在向纵深发展,值得我国宗教学界和伦理学界予以高度重视,而研究者若不具有文化视域,亦很难理解寻求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重要意义,进而从单一思路出发予以否定。

文明的历史表明,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将在社会行为的控制理论上相应地产生新的要求,从而使旧的伦理观念陷入危机之中,并与变迁着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这就要求伦理学家们在把握社会变迁之根源的基础上,以时代的要求为使命、为动力,为社会进步提供与传统价值观、伦理观之间具有内在衔接性的新学说,从而克服社会伦理危机,推动社会进步。

着眼于全球,我们身处一个总体上政教分离、宗教多元共存而又共趋现代文明的现代社会。那么,在现时代条件下,宗教与伦理将以何种方式发生相互作用呢?就全球范围来说,宗教与伦理结合有哪些基本模式呢?就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来说,宗教与伦理应如何结合呢?

笔者感到,当前学术界谈论的宗教与伦理相结合的侧重点不是宗教这个文化子系统内部的宗教与伦理的关系,而是统一的文化大系统中宗教与伦理的关系,亦即宗教与世俗伦理的关系。因为在宗教这个文化子系统中,宗教与伦理的结合并不存在什么理论上的障碍。文化哲学家们早已指出:“宗教中无论任何方面,也无论任何信条,都不能没有其伦理方面的相配部分”[1] p. 78。卡西尔指出:“事实上,从一开始起,宗教就必须履行理论的功能同时又履行实践的功能。它包含一个宇宙学和一个人类学,它回答世界的起源问题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而且从这种起源中引出了人的责任和义务。”[2] p. 120。宗教家们把道德引来作为信仰者获得宗教之各种美好许诺的前提和保障,使宗教信仰同道德之间的矛盾,因着人类生存的目标,得到了合乎人类情感逻辑的解决。另一方面,道德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系统,宗教信仰则是精神规范系统。任何信仰者都既是宗教团体的一分子,又必定是社会的一分子,必然要与社会道德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一名宗教信仰者既有其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特定的道德,亦无法逃脱一般社会道德之网。因此面向全球、面向未来、面向世俗社会上的宗教在宗教与伦理相结合的问题上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涵纳和推介那些能够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某些伦理准则,而非那些与某些宗教或某些意识形态特有的信条直接挂钩的伦理准则,例如敬仰某种宗教所信奉的神祇或忠诚于世俗领袖。

以孔汉思倡导的全球伦理为例。他试图以宗教信念为基础,以世俗伦理为具体形式建构全球伦理。这种普遍伦理不是某具体宗教的伦理,也不是若干世界宗教伦理的共同成分,而是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化普遍认可的伦理。孔汉思先生在一个以宗教为聚焦点的文化视域下,从宗教进入一般伦理,进而探讨宗教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可能性,最后以多宗教的共同信念为基础,以世俗伦理为具体表现形式,倡导有形可见的“全球伦理”。这一模式相对于全球信仰状态而言(全世界信教人数约占总人口的80%),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中国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也提出了伦理与宗教相结合的理论模式,例如万俊人教授的“普世伦理”。<sup>①</sup>他指出:“普世伦理是一种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以人类基本道德生活、特别是有关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淑世道德问题为基本主题的整合性伦理理念。”[3] p. 29。依据以上有关伦理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联的了解,我们可以这样来确定普世伦理的基本理论维度:在信仰伦理或道德形上学、社会规范伦理和个人心性美德伦理三个层次之间,普世伦理将以社会规范伦理为其基本理论维度,同时保持对信仰伦理与美德伦理的开放性探讨。这种理论定位是由普世伦理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其“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理论立场所决定的。[3] p. 45。他试图以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整合各种伦理资源,通过对若干人类普遍拥有的理念(人权、正义、自由、平等、宽容)所蕴涵的伦理意义之阐释来确定人类的道德共识和相融互通的伦理理念,通过道德教育使普遍伦理规范能够获取不同文化传统之中的各民族人民的广泛认同和

① 参阅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支持,最终使之内化为全体社会公民(在普世伦理的视野内即是“世界公民”)的有效方式。相对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信仰宗教的人数不占总人口的多数)来说,万俊人教授对普世伦理的界定有着十分正当的理由。基于对宗教在现代社会重要作用的肯定,万俊人教授以一种承认“宗教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资源”的方式由伦理进入宗教。但他马上也指出:“然而站在现实主义的伦理学立场上,我们并不认为宗教伦理的方式是一种(更不用说惟一)现实可行的普世伦理的建构方式。”<sup>[31]p.77</sup>他的做法打通了以往中国学术界宗教与伦理的僵硬界限,参与了创建“全球伦理”的思想运动。凡了解中国学术界以往对宗教与伦理关系认识的学者,不难体会到迈出这一步的艰难。

由上可见,在现时代条件下讨论宗教与世俗伦理的结合,首先要在学理上承认宗教与世俗伦理相对独立的地位,进而提取诸宗教和意识形态在伦理层面的共同性成分。这样的结合既不要求消除具体宗教的特性,也不要求消除具体意识形态的特质,而只是谋求一种多元共存状态下的共识。在笔者看来,这一谋求共识的过程就是宗教与伦理的互渗和融通。

### 三、全球伦理准则的信仰化或信念化

任何一种系统宗教或意识形态都有其相应的道德规范,而这些规范都已经融入其信仰体系。道德之所以能起作用,就在于信仰这种意识形式所起的保证作用。不能带来道德力量的宗教信仰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带来道德力量的非宗教信仰也是不可思议。

寻求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思想运动经过多年努力,已经提出了一些“有约束性的基本原则”或“规范性伦理原则”。我们现在迫切要考虑的是如何使之成为全人类共同生活的道德准则,使之能起到重整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无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什么,这一过程的实质是这些基本原则的信仰化或信念化的过程,而目前我们还无法知道这些普遍伦理规范已经或能够内化到什么程度,或在多大范围内化。

在这些基本准则如何信仰化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一条“下降之路”和一条“上升之路”。对于各种信仰团体来说,这些基本准则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基本信仰之中,它们需要做的是发挥自身优势,介入社会生活的道德层面,为解决世界性的道德危机做贡献。这是一条下降之路,是从神圣的层面出发,解决世俗的危机。可以说,以信仰的方式融摄涵纳社会道德规范,也是这些宗教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不信宗教,却受某种意识形态支配的团体或民众来说,他们同样需要发挥自身优势,为解决世界性的道德危机作贡献,这是一条上升之路,是从世俗的层面将其认可的这些基本原则提升到神圣的境界,使之成为约束其成员的力量。道德必趋于神圣化而后方有权威性,道德的信仰化与神圣化是道德发挥社会作用 and 功能的必由之路。

创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需要,但又极易被人们斥为乌托邦。尽管乌托邦在人类历史和思想史上并非毫无积极作用,但“全球伦理”倡导者决不希望自己的理论建构成为“一种新的人类道德乌托邦设想”。全球伦理的倡导者们基于对全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切,坚信这些原则的正当性和普适性,并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同这些原则并身体力行。笔者认为,全球伦理(工商业世伦理)的魅力正在于此,因此它也将继续引起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的共鸣。倡导的主旨是为了达成,但是仅仅阐述现实的迫切需要无法确保“全球伦理”理论上的正确无误,因此,在全球伦理的创导者们已经提出相当完整的理论框架以后,我们要将思考的重点放在如何使这些基本道德准则信仰化或信念化上。笔者期待着学术界能在今后更多地关注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发表自己的见解,使相关的讨论向纵深发展。

## [参 考 文 献]

[1]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2] 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责任编辑 曾建林]

## 音乐教育的特殊功能

素质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区别于应试教育、技能教育,但又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它是一种具开发性的心理教育,是情感和意志道德的教育。素质教育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来影响人的心理素质,以推进人的全面均衡的发展,而音乐教育则是其中一个有效的手段和不可缺少的方面。

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非语义性、非概念性和非视觉性,这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可以说是一种概括性很强而又相当抽象的艺术学科。

同时,音乐本身又是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体验与想像、情感与理智、活动与思维的统一体。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它在训练人的心理活动能力、完善人格和激发创造力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由于音乐的音响结构在时间中展现出有序的不可逆性,建构原则的重复、对比、再现、变化统一和多声部的特性,对人在不同层次上的认知活动及其相互转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少研究显示:人的智力除了理性判断外,还包括语言能力、音乐感悟力、辨别空间的能力、了解他人内心的能力和逻辑数学能力。这就是人的成才大体依靠的两个因素:“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指人在认识方面的能力。如观察力、思维力、记忆力、注意力和想像力等。这主要由认知教育来完成。“非智力因素”大致包括兴趣、情感、性格、意志、道德、思想和态度几个方面。当然,幻想和想像的某种能力也可归入这个范畴。而这些主要是由审美方面的教育来完成的,音乐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许多最后获得成功的人才,主要在“非智力因素”方面表现突出,而这些“智力因素”往往成为他们作出卓越贡献的关键动力。也就是说,任何成功的人生都是其智能和情感智慧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音乐教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实质,恰恰是通过情感与心理中介的训练和培养达到影响人的审美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目的。因此,它在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综合能力的均衡发展水平上,在弥补人的先天素质缺陷上,有着其他教育方式所不可替代的功能。

音乐教育可以使人灵魂得以净化,给人的内心世界留下深深的印痕。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穿透人的情感,使人灵魂得以净化,给人的内心世界留下深深的印痕,帮助人树立高尚的审美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智能和情感智慧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音乐教育可以启迪智慧,促进形象思维,培养创新能力,使学生的各方面得到均衡协调的发展。它能促进学生的形象思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力量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具有辩证唯物地分析事物的能力。

音乐教育还可以使人感知、想像、情感、理解等诸种心理能力处于一种极其自由和谐的状态。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中,各种能力既能共存,又能相互配合,每一种能力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又兼顾到整体。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完美的人格,而完美人格的形成最终会使人的创造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已受到教育界人士的广泛认可。音乐教育的水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着社会文明的水准,体现着教育的水准。它既有正面建设的功能,有助于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廓清消极、腐朽、落后的东西,同时,还可以培养人的创造性思维,使人格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汤琦)